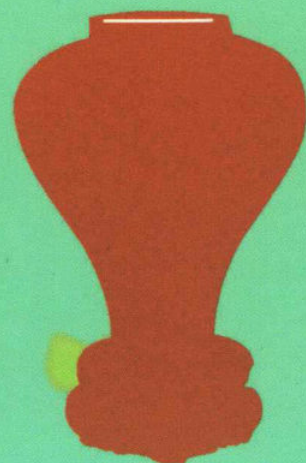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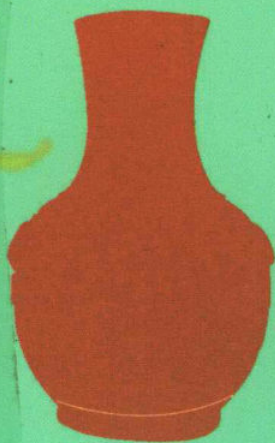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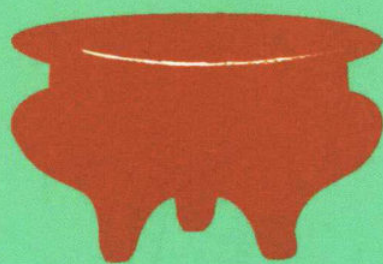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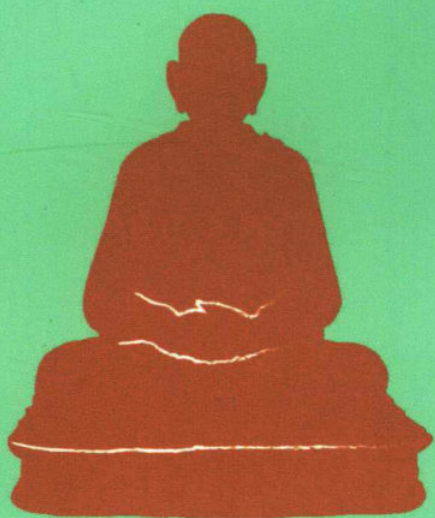


海外陶瓷研究名家译丛

中国陶瓷史： 从远古到元代

〔英〕J. 霍布森 著

邓宏春 译



 江西高校出版社
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

海外陶瓷研究名家译丛

中国陶瓷史： 从远古到元代

〔英〕J·霍布森 著
邓宏春 译



 江西高校出版社
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陶瓷史. 从远古到元代/(英)R. L. 霍布森著; 邓宏春译. --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21. 11 (2022.3重印)
(海外陶瓷研究名家译丛)
ISBN 978 - 7 - 5762 - 2159 - 6

I. ①中… II. ①R… ②邓… III. ①陶瓷—工艺美术史—中国—远古—元代 IV. ①J5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1)第 211522 号

中国陶瓷史:从远古到元代

ZHONGGUO TAOCISHI; CONG YUANGU DAO YUANDAI

出版发行	江西高校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
总编室电话	(0791)88504319
销售电话	(0791)88522516
网 址	www. juacp. com
印 刷	天津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1.5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21 年 11 月第 1 版 2022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762 - 2159 - 6
定 价	78.00 元

赣版权登字 - 07 - 2021 - 144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随时向本社印制部(0791 - 88513257)退换



卷首插图 罗汉像,产于唐朝,大英博物馆藏品



译者前言

从 19 世纪末开始,西方对中国陶瓷的研究开始向学术方向转化,出现了许多西方研究中国陶瓷的学者和学术著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英国学者罗伯特·洛克哈特·霍布森(1872—1941),他长期供职于英国大英博物馆,曾担任英国东方陶瓷学会会长。1915 年出版的 *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两卷),是西方第一部以全方位、大历史角度研究中国陶瓷的专著,使他成为西方研究中国陶瓷的权威。自这两卷书出版至今,时间虽然过去了 106 年,但书中描述的中国陶瓷的发展历史和具体种类,今天读来仍饶有兴趣,对我们了解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方学者视野下的中国陶瓷概况及其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促进当代国际陶瓷文化的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我们着手翻译 *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两卷)的初衷。

需要说明的是,罗伯特·洛克哈特·霍布森所著 *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 的第一卷由我负责翻译,第二卷由我的同事金慧君负责翻译。原书两卷的书名均为 *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但描述的内容不同。第一卷着重描述中国陶瓷从远古时期、汉朝、唐朝、宋朝到元朝的发展历史,重点研究了一些著名的窑口,如汝窑、定窑、哥窑、官窑、钧窑、龙泉窑、建窑、景德镇窑、广窑、宜兴窑,并详细论述了中国陶瓷上的款识。第二卷着重描述明朝和清朝的瓷器。基于此,我们将这两卷书的译稿书名分别定名为《中国陶瓷史:从



远古到元代》和《中国陶瓷史：明清瓷器》。严格来说，第一卷的内容并不单纯局限于元朝之前的中国陶瓷，明清瓷器及其款识也有论述，因此，《中国陶瓷史：从远古到元代》这一书名并不算特别准确。另外，在翻译第一卷时，我根据当代著作的体例编排，将原书目录中的参考文献放到译本正文之后。作为一名来自瓷都景德镇的高校教师，能翻译罗伯特·洛克哈特·霍布森的陶瓷专著，为中外陶瓷文化交流尽一份绵薄之力，我深感荣幸。在翻译过程中，我查阅了大量的陶瓷专业资料，但由于自己陶瓷知识储备不足和能力有限，因此本书一定存在许多不足甚至是翻译错误，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邓宏春

2021年8月



目录

CONTENTS

- 简介 /1
- 第一章 远古时期 /9
- 第二章 汉朝(前 206—220) /12
- 第三章 唐朝(618—907) /26
- 第四章 宋朝(960—1279) /43
- 第五章 汝窑、官窑和哥窑 /49
- 第六章 龙泉窑 /63
- 第七章 定窑 /73
- 第八章 磁州窑 /84
- 第九章 钧窑和建窑 /93
- 第十章 和陶瓷有关的奇闻趣事 /111
- 第十一章 瓷器及其起源 /113
- 第十二章 景德镇 /121
- 第十三章 元朝(1271—1368) /125
- 第十四章 广窑 /129
- 第十五章 宜兴窑 /135
- 第十六章 各式陶器 /141
- 第十七章 中国陶瓷款识 /156
- 参考文献 /172

简 介

中国国土广袤,人口众多,欧洲在这两方面均难以匹敌。此外,中国人天生具有陶瓷艺术天赋,对陶瓷生产怀有深厚的情感,他们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居住和劳作了两千多年(让我们仅仅追溯到汉朝时期吧)。基于这样的事实,尝试着在两卷的篇幅里描述陶瓷生产这样一个广阔而多样的行业的历史,似乎有点儿胆大妄为。对于这一主题,任何研究都不可能达至终点,而完整地记录中国过去和现在出现的每一类陶瓷,也是无法企及的奢望。

就陶器而言,有人确定了一些著名的品种,从历史或地域的角度对陶器做了大致的分类,对此我们应该感到高兴。的确,中国历史记载中有名称的陶器仅仅是曾经出现过的陶器的一小部分。虽然我们偶尔会快乐地在藏品中发现某个系列的陶器,比如我们可以明确其产地的宜兴红色粗陶器,但是绝大部分陶器的身份仍是不明的。英国或欧洲大陆有多少专家能够识别出一百年前德国南部或匈牙利制造的陶器?辨认出中国最有名的陶器的概率有多大?

谈到与陶器有着明显区别的瓷器,我们有一个更简单的观点。今天我们在欧洲看到的瓷器不早于明朝,并且主要产于两大制瓷中心,即江西景德镇和福建德化。从地域来研究瓷器比较容易做到,而且为我们按照历史分期来研究瓷器提供了大量的信息。

中国瓷器年代久远,种类繁多,美不胜收,数百年来积累了精湛的制瓷技艺,这使得中国瓷器艺术研究尤为引人入胜。各种类型的瓷器可以满足不同人的品位。从年代来看,与中国瓷器相比,欧洲瓷器似乎是“昨天”才出现的,仅有两百年的历史,而且从一开始就是以中国瓷器为模板。甚至在德国迈森和法国塞夫勒设计的所谓欧洲装饰风格的瓷器,虽然在整体效果上非常西方化,但仔细分析,它们仍具有中国元素。比较东方瓷器和西方瓷器的艺术特色是毫无用处的。

这是一个涉及个人品位的问题。就我本人而言,我觉得中国人的装饰天才和天生的色彩感,加上长期的训练,使他们的品位要远远优于欧洲的追随者,因此比较两者的品位并无意义。即使是为出口贸易而生产的更普通的中国古瓷器,也有着不可否认的装饰特色,而具有纯正中国品位的瓷器,尤其是宫廷瓷器,在质量和材质方面更是不可超越。

中国人向来欣赏瓷器的长处与美丽,从很早开始就将瓷器视为珍贵的物品。中国诗人频繁赞颂瓷器精美的质地、如玉的色泽、敲击时动听的回声、轻巧优雅的外形。唐朝越州窑的青瓷杯被比作模制的荷叶;大邑白瓷碗胜过霜雪^①。许多诗歌是诗人在茶酒聚会

^① 大邑,今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唐朝诗人杜甫《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云:“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译者注



上,从瓷碗中获得灵感而创作的。文人墨客们诗兴大发,时常进行联诗游戏。《景德镇陶录》^①记载,景德镇附近的云门教院有一座亭子,内有一块碑,上面写有“素瓷传静夜,芳气满闲轩”,记叙的是公元1101年一些著名人物举行的饮茶会,这里毫无疑问提到了当地制造的瓷器。在该书另一处,我们读到一处文人开怀畅饮的情节:他们看到定州白瓷碗,顿时有了灵感,于是开始联诗。其中一个人写道:“定州花瓷瓿,颜色天下白。”另一个人接着写道:“轻浮妾玻璃,顽钝奴琥珀。”第三个人继续写道:“器质至坚脆,肤理还悦泽。”

张谦德(1577—1643)是明万历时期关于瓶花艺术的著作《瓶花谱》的作者,他规劝我们:“贵磁(瓷)、铜,贱金银,尚清雅。”

中国人对文物的欣赏无人能及,私人收藏往往被小心守护,令人艳羡,旁人难以一睹真容。甚至在16世纪,如要购买宋瓷,相对来说,也需要支付一大笔钱,而一个仅有一百年历史的明代鸡缸杯值三十英镑不足为奇。拥有一件上等的文物,比如宋瓷,能让主人成为名人,而如果当地的长官恰好是一个贪财的人,那这件文物的主人也许会更加惹人注意。

在本书第五章,讲述了一件哥窑香炉(后来以两百盎司金子的价格卖出)的故事。在明朝早期,这件香炉使一个人锒铛入狱,饱受折磨。此外,如果消息准确,在最近的革命中发生的一件事应该能触动收藏家的弦。一位著名的将军,像众多中国政要一样,是一个狂热的收藏家,他正盼望从上海来的一件上等瓷器。装瓷器的盒子如期而至,被送到了将军的房间,他走上前去准备打开它,内心充满渴望,极力压抑着兴奋的心情。这种紧张时刻的心情,收藏家们一定感同身受。然而,打开的瞬间,一枚炸弹将他炸得粉碎!——这位将军的敌人对他在防御中的弱点了如指掌。

收藏在英国是一项风险略低的活动,即使不是如此,狂热的收藏家也不会被吓唬住。警告对他没用,他会追寻收藏目标,尽管这条路上洒满了轻率的同伴的血泪。他也不会因为其他同伴的困境而沮丧。正如《景德镇陶录》里讲述的唐鹤征与宋代白色三足鼎的故事^②一样:这只三足鼎仿制得非常逼真,就连其主人——16世纪最有名的收藏家之一的唐鹤征,也不能将它与真品区分开来。一位18世纪的中国学者指出了这个故事的寓意:“当鉴赏家们充满赞赏地指着一件瓷器,并说它是定窑器或官窑器时,我们怎么知道它不是蒙蔽了这些鉴赏家们的‘假冒三足鼎’呢?”这一问题的警示力量将会使宋瓷收藏家们心存感激,特别是白定瓷和青瓷收藏家,因为对白定瓷和青瓷这两种历史悠久的瓷器进行正确分类,是瓷器分类中最困难的。然而,我们还是可以接触到一些宋代真瓷,并

^① 《景德镇陶录》,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景德镇陶瓷史专著,清朝景德镇人蓝浦著,共六卷,后经其弟子郑廷桂增补为十卷。——译者注

^② 见本书第七章。——原注

用它们来培养辨别力,这样的话,除非是极佳的仿制品,否则没有瓷器可以蒙蔽我们的双眼。而且,如果我们成功地得到了一件宋瓷的明代优质仿制品,我们应该感到幸运,因为如果我们发现了真相——这似乎不太可能——当我们想到那个以三百英镑买下唐鹤征的三足鼎臚品,并“兴高采烈地回家”的瓷器收藏狂热者时,我们可以得到慰藉。

尽管在过去有一些关于东方陶瓷的著作出现,但东方陶瓷研究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而且未来的研究任重道远。但是我们的陶瓷知识一直在不断增长,近年来陶瓷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欧洲第一本关于中国瓷器的重要著作是法国人儒莲翻译的《景德镇陶录》,于1856年出版。儒莲是汉学家,但不是瓷器专家,所以这本译作不可避免地有一些对原作的误解,随后的一些学者一味地盲从这本译作,对书中的很多细节困惑不解。1876年发布的奥古斯塔斯·沃拉斯顿·弗兰克斯瓷器藏品目录,是对东方瓷器以易懂的体系进行分类的最初尝试之一。但当时有人觉得,人们所了解的知识有限,对瓷器藏品按照历史时期进行分类不能做到公正合理,而且根据颜色和装饰过程来分类的不太科学的方法,只是一种权宜之计。19世纪末,卜士礼博士撰写了专著《东方陶瓷艺术》(*Oriental Ceramic Art*)。不幸的是,这本书较难获得。同时,卜士礼博士还对科斯莫·蒙克豪斯的优秀著作《中国瓷器史》(*A History and Description of Chinese Porcelain*)进行了编辑,后来又编纂了南肯辛顿博物馆手册,翻译和再现了中国16世纪明朝收藏家和鉴赏家项元汴的著作《历代名瓷图谱》,并出版了更为重要的《陶说》译本。卜士礼博士的这些努力,使中国陶瓷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卜士礼博士这些先驱性的作品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我在此要表达衷心的感谢,因为卜士礼博士免费让我使用他的著作。更重要的是,在必要时,我对他的译作可以自由地进行批评。汉语的显著特征是语义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对复杂篇章的理解就会出现差异,这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我认为,如果不对原文中的关键段落加以核实,就对某个译作评头论足是不明智的。基于这个原因,我觉得很有必要去研读可获得的中文陶瓷文献。如果没有翟林奈博士(Dr. Lionel Giles)^①提供巨大的帮助,为我指点迷津,仅凭我对汉语的粗略了解,是不可能完成这一艰巨任务的。此外,在本书所有关键的段落,我给出了相应的中文版本,这样读者就可以在阅读过程中了解其真正的含义。

卜士礼博士的贡献大大简化了对后期中国陶瓷的研究。但是,对于与陶器和早期器皿有关的更古老的书籍,人们却关注不多或根本没有关注。在欧洲,研究陶器和早期器皿所必需的素材匮乏。我们的藏品中可见一些零星的粗糙陶器和出口器皿,但数量不多或重要性不足,不能引起公众的兴趣,而且早期陶器和器皿在西方市场的销售状况也不会诱使本地收藏家放弃已收藏的罕见和珍藏的样品。在过去的几年里,情形发生了根本

^① 翟林奈博士(Dr. Lionel Giles, 1875—1958),又译为小翟理斯,英国人,维多利亚时期的学者、翻译家,汉学家翟理斯之子。——译者注



的改变。中国对外敞开国门，同时欧洲人享有越来越多的机会，不仅可以参观中国古代艺术纪念馆，而且可以获得早期的绘画、雕塑、青铜器、玉器和陶瓷珍品，这些使西方研究者对中国艺术早期阶段的伟大成就有了更真实的了解，也引发了西方研究者对早期中国艺术的新鲜而广泛的研究热情。大量的物品在墓地被发现，它们在艺术和考古学方面都非常有趣，这些墓地是在铁路施工过程中偶然被打开的。尽管这些物品的采集是在无计划和无法精确分类的情形下进行的，但是人们学到了很多知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早期中国艺术的研究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许多收藏家组建了各自的藏品，由此引发的竞争使得一些中国收藏家的珍品也流入了市场。政治局势是影响收藏的另一因素，自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来，西方收藏家从中国动荡的政治局势中获利颇多。

从陶瓷的角度来看，以上改变所带来的结果是，我们现在对汉代陶器已经熟悉了；唐代陶瓷艺术也令人惊喜地露出了绚丽的真容；研究宋代瓷器，问题不再是历史分期，而是对瓷器实物进行分类；看待明代瓷器的视角更清晰了，对清代瓷器所掌握的大量信息因为更深入的研究而得到了修正和补充。事实上，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现在该是评估当前形势，呈现所收集的材料的时候了。当然，我们并不是想要一锤定音，而是为更进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础。我这两卷书的写作目的也正在于此，我仅仅是试着将收集到的现有研究中国陶瓷的资料呈现在研究者面前，并加上我自己的结论和评论，而研究者可以接受或不接受我的结论和评论。

近年来，我们知识最显著的增长毫无疑问与唐代陶器有关。先前一片空白的领域现在充满了丰富多样的陶瓷，从柔软的、灰泥状的材料到彩陶和炆器，再到真瓷。在技术方面，唐代陶工没有可资学习的经验。他们使用软质铅釉，包括铅氧化物产生的绿色、蓝色、黄褐色和紫褐色釉，这些铅氧化物也是明代瓷器釉色的基础。他们也使用高温焙烧长石质釉，包括白色、褐绿色、巧克力色、紫黑色、茶叶末绿釉，有时也含灰色或蓝灰色泡沫状的斑点，类似于宋代瓷器的釉色。这些釉有时会像日本茶杯上的釉一样，叠加在一起，但有人说日本茶杯的制造技术仿制于中国茶杯。很明显，条纹和斑驳的效果是为了特别迎合时代的品位，在釉和瓷胎上留下大理石花纹图案是流行的做法。在浅浮雕上雕刻花纹，或是用尖的工具在瓷胎上雕刻，再用彩釉填充空隙，将一些小花纹印在瓷胎上，最后将事先用模型压制好的浮雕按在瓷胎上，是装饰瓷器表面的方法。一些墓葬器皿上有在未焙烧的颜料上彩绘的图案，现在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绿釉下用黑色颜料绘图是唐代陶工的装饰方法。此外，瓷器在唐代就已出现，是明确证实的事实。

唐代陶瓷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在器型和一些特定的装饰细节上带有明显的希腊风味，特别是在器型方面。唐代艺术可观察到的其他外来影响，来自波斯萨珊王朝(Sassanid Empire)、斯克泰-西伯利亚(Scytho-Siberia)和印度。我们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中国艺术处于一种独特的、乐于接受外来文化的状态。唐代以后的时代，其艺术是传统型的，我

们认为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而与之相比,唐代艺术别具一格,在许多方面都带有舶来品的特质。

研究唐代陶瓷为我们呈现了许多惊喜,而毫无疑问的是,这一领域将有更多未解之谜等待我们去破解。的确,有许多研究空白需要填补,有许多明显的异象需要解释。对于汉代和唐代之间近四百年的陶瓷艺术,我们仍然是一无所知的。这四百年间的佛教雕塑表现出高水平的艺术发展态势,同时我们可以认为,其他小众艺术,包括陶瓷,并没有被忽略。当考古发掘使我们对这段模糊不清的间隔期有了一些认识后,毫无疑问,我们应该明白,我们制定的历史界线太过死板,汉代器物的历史必须要推后一些,唐代器物的历史必须要推前一些,这样就可以弥补中间的空白期。同时,我们只能充分利用目前已经揭示的事实,使我们的分类尽可能地灵活。可能软质铅釉属于唐代早期,可以追溯到隋朝和魏晋时期,与汉代陶瓷的绿釉联系起来,而高温焙烧釉在唐代后期逐渐取代了软质铅釉。

高温焙烧的长石质釉似乎在宋代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而据我们观察,铅釉一直到明代才再次出现。

宋代是高温焙烧釉时代,釉的种类丰富,釉色浓艳且变幻无穷,其色调微妙且常出人意料。宋代也是一个大胆和自由的制瓷时代,瓷器造型奔放、阳刚,是一个纯粹的瓷器时代。在特定的瓷厂,黑色黏土和彩色黏土上会使用彩绘装饰,有时甚至用红色釉彩和绿色釉彩。但是,陶工仅在瓷胎上进行的刻花、划花和模印等真正意义上的陶瓷装饰,更受人们的喜爱,而彩绘装饰则稍逊一筹。

如果我们满足于对宋代陶瓷做一个综合性分类——就像不得已对待唐代陶瓷一样,那么在这一部分我们面临的一个主要困境就可以避免了。但是,中国人给我们提供了许多重要类目,有了这些类目,我们必须对拥有的陶瓷样品进行分组。有些瓷器样品的身份已经确定无疑,其他样品的身份却仍然模糊不清,而且还有许多样品,尤其是粗制陶瓷,不能归为任一类主要品种。然而,真正的收藏家不会因为与宋代陶瓷有关的难题而感到沮丧,他会沉湎于这些难题,高兴地发现他有新的研究可以突破,许多谜团有待破解,这是一个值得他付出勇气来精通的领域。

很明显,至少在宋代,某个瓷厂采用了一种粗糙的蓝色绘画形式,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的是,釉下和釉上首次绘画尝试比我们先前假设的时期早几百年。青花瓷和多色釉瓷耗费了明代景德镇御器厂陶工们的主要精力,这两类瓷器的经典时期在15世纪。宋代瓷器流行的釉色在宋代和明代之间的元代几乎不再存在,一位中国学者告诉我们:“明代开始,秘色^①开始消失。”图画装饰和彩绘织锦图案在明代瓷器上开始流行。我们可以观察

^① 秘色,这一术语用来泛指青瓷的釉色,这位学者所说的青瓷是指从唐代“千峰翠色”的越窑瓷,后周“雨过天青”的柴窑瓷,到宋代汝窑瓷、官窑瓷、哥窑瓷、冬青釉瓷、龙泉窑瓷等著名的瓷器。——原注



到,相比后期的瓷器,明代瓷器的绘画设计更加自由,也更具个性。清代景德镇陶工的兴趣广泛,制瓷技艺高超,闻名遐迩,不仅生产特色陶瓷如康熙青花瓷、五彩瓷、郎窑红瓷和豇豆红釉瓷,开发了粉彩瓷,还复兴了宋代和明代经典时期所有著名的瓷器。当穷尽以上这些瓷器后,他们又把目光转向其他材料,惟妙惟肖地在瓷器上仿制金属、雕刻的石头、漆器、木材、贝壳和玻璃上的装饰……总之,一切有艺术特征的物质,不管是自然还是人造物质,无所不仿。

要精通东方陶瓷这个庞大和复杂的领域,需要通过书本和藏品来广泛学习制瓷历史和技术。理论和实践学习应该同时进行,因为二者缺一不可,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拥有一些陶瓷实物,可以自由把玩和近距离研究,是一项巨大的优势,而这些陶瓷实物不必非常昂贵。事实上,破碎的瓷片也可以和完整的瓷器一样,提供同样多的关于瓷胎和釉色的信息。没有机会拥有瓷片的瓷器研究者,可以在公共博物馆获得大量的学习机会,大多数大城市有公共博物馆。旅行者可以在旅行指南的引导下找到公共博物馆。我在这里只列举一些我去过的重要的博物馆,同时也对这些博物馆为我提供的巨大帮助表达由衷的感谢。

伦敦: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拥有著名的乔治·素廷(George Salting)藏品,其中可见清代最佳的珍品瓷器。此外,该博物馆还有自身积累的藏品,以及规模稍小的许多捐赠品、礼物和借来的展品,代表了各个时期的艺术特色。大英博物馆的奥古斯塔斯·沃拉斯顿·弗兰克斯爵士(Sir Augustus Wollaston Franks)^①藏品,包罗万象,极具代表性,是陶瓷研究者必定参观的最佳的藏品之一。

伯明翰(Birmingham)^②和爱丁堡(Edinburgh)^③的美术馆有许多重要的藏品,其多数大城镇的博物馆也有一些中国陶瓷。

巴黎:卢浮宫的恩斯特·格兰迪迪耶(Ernest Grandidier)^④藏品是世界上最大的藏品之一。赛努奇博物馆(The Cernuschi Museum)^⑤藏有许多有趣的陶瓷,特别是早期青瓷。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⑥和塞夫勒^⑦博物馆(the Sèvres Museum)也有重要的陶瓷

① 奥古斯塔斯·沃拉斯顿·弗兰克斯爵士(Sir Augustus Wollaston Franks, 1826—1897),大英博物馆首任英国和中世纪藏品负责人,英国收藏家。——译者注

② 伯明翰(Birmingham),人口与面积仅次于伦敦的英国第二大国际化城市。——译者注

③ 爱丁堡(Edinburgh),英国著名的文化古城,苏格兰首府。——译者注

④ 恩斯特·格兰迪迪耶(Ernest Grandidier, 1833—1912),法国收藏家,1894年出版法语专著《中国陶瓷》。——译者注

⑤ 赛努奇博物馆(The Cernuschi Museum),法国第二大亚洲艺术博物馆,位于巴黎,1898年开馆,以其创始人——银行家、记者和收藏家亨利·赛努奇(Henry Cernuschi)名字命名。——译者注

⑥ 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由里昂工业家爱米尔·吉美(Emile Guimet)于1889年正式建立,位于巴黎,是主要展现埃及、古罗马、希腊和中国等国家的宗教文化的博物馆。——译者注

⑦ 塞夫勒(Sèvres),位于法国巴黎郊区。——译者注

藏品。

柏林:柏林装饰艺术博物馆(The Kunstgewerbe Museum)^①拥有一个小型藏品,包含了一些重要的陶瓷实物。霍亨索伦博物馆(The Hohenzollern Museum)和夏洛腾堡宫(the Palace of Charlottenburg)^②有一些主要在17世纪末形成的历史藏品。

德累斯顿:主要由波兰国王、萨克森选帝侯(Elector of Saxony)奥古斯特二世强力王(Augustus II the Strong)(1670—1733)形成的著名历史藏品,在约翰诺伊姆(the Johanneum)展出,对研究康熙瓷器尤其重要。柏林装饰艺术博物馆的施蒂贝尔(Stübel)藏品,也非常有趣。

哥达(Gotha)^③:公爵博物馆(The Herzögliches Museum)拥有一系列重要的宋代和元代陶瓷,是由夏德(Friedrich Hirth)教授收藏的。

科隆(Cologne):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重要且布置独特,由已故的阿道夫·菲舍尔(Adolf Fischer)及其妻子收藏,隶属于柏林装饰艺术博物馆。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中,明朝和清朝瓷器收藏特别丰富,幸运地拥有恢宏的皮尔庞特·摩根藏品(Pierpont Morgan Collection)和艾弗里藏品(the Avery Collection)。如果阿特曼藏品(the Altmann Collection)能按时在博物馆展览馆陈设,那明朝时期的瓷器收藏将是无与伦比的。伦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有一系列汉代精品陶器。

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The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汉朝陶器和唐朝小雕塑藏品。这个博物馆也收藏了一系列有趣的后期的中国陶瓷,包括来自一些现代工厂的实物,对于比较研究很重要。这些藏品是在中国的劳费尔博士(Dr. Laufer)收藏的。芝加哥艺术博物馆(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也有少量后期中国瓷器藏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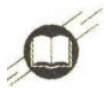
波士顿:波士顿美术博物馆(The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拥有可观的中国瓷器藏品,其中早期的中国瓷器得到了特别呈现。美国藏品,无论是公共藏品还是私人藏品,在单色釉瓷器方面尤其丰富,并且大大领先于欧洲的藏品。

要逐一感谢各类博物馆的负责人对我的热情帮助,可能会占用很长的篇幅,因此我在这里一并感谢他们,希望会获得他们的原谅。我要感谢的私人藏家有很多,他们为我提供了一切便利来研究他们的藏品。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免费为我提供插图,如插图所

① 柏林装饰艺术博物馆(The Kunstgewerbe Museum),成立于1868年,是国际上重要的装饰艺术博物馆。——译者注

② 夏洛腾堡宫(the Palace of Charlottenburg),是德国柏林现存最大的霍亨索伦王朝宫殿,如今作为博物馆对外开放。——译者注

③ 哥达(Gotha),德国中部城市。——译者注



示。我要特别感谢乔治·尤摩弗帕勒斯先生(Mr. George Eumorfopoulos)^①、威廉·克里夫利·亚历山大先生(Mr. William Cleverly Alexander)^②、R. H. 本森先生(Mr. R. H. Benson)、S. T. 彼得斯先生(Mr. S. T. Peters)、查尔斯·兰·弗利尔先生(Mr. Charles Lang Freer)^③，他们为我研究英国和美国早期瓷器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没有这些热情的藏家的无私帮助，我是不可能完成这套丛书的第一卷的。我对乔治·尤摩弗帕勒斯先生的感激之情可以从本书插图中感知到，他的藏品本身对我就是一种教育，他允许我自由地利用这些藏品，并学习他丰富的经验。在本书各部分，许多其他同样帮助我的藏家中，我必须感谢海格立斯·里德爵士(Sir Hercules Read)^④、S. E. 肯尼迪先生(Mr. S. E. Kennedy)、A. E. 坎伯巴奇博士(Dr. A. E. Cumberbatch)、C. L. 罗森斯坦先生(Mr. C. L. Rothenstein)、布鲁尔博士(Dr. Breuer)、C. 塞利格曼博士(Dr. C. Seligmann)、M. R. 克什兰(M. R. Koechlin)、奥斯卡·拉斐尔先生(Mr. Oscar Raphael)^⑤、A. E. 贺璧理先生(Mr. A. E. Hippisley)、埃文·查特里斯(Hon. Evan Charteris)、万蒂奇女士(Lady Wantage)、伯德特-库茨先生(Mr. Burdett-Coutts)、已故的 A. 菲舍尔博士(the late Dr. A. Fischer)、L. C. 梅塞尔先生(Mr. L. C. Messel)、威廉·伯顿先生(Mr. William Burton)、戈夫上校(Col. Goff)、哈尔西夫人(Mrs. Halsey)、哈夫迈耶夫人(Mrs. Havemeyer)、G. A. 施奈德牧师(Rev. G. A. Schneider)、科尔塔特夫人(Mrs. Coltart)。威廉·伯顿先生阅读了本书的部分清样。金璋先生(Mr. L. C. Hopkins)^⑥经常为我提供中文帮助，特别是帮我阅读篆书。我的同事翟林奈博士，除了为我提供翻译方面的帮助，还同意浏览本丛书的两卷清样，特别关注中文汉字中的错误。最后我要感谢我的领导海格立斯·里德爵士，他不仅为我提供所有可利用的大英博物馆的设施，也在他所擅长的陶瓷研究领域为我提供了热情的指导。

罗伯特·洛克哈特·霍布森

① 乔治·尤摩弗帕勒斯(George Eumorfopoulos, 1863—1939)，英国人，20世纪上半叶颇具影响力的中国艺术收藏家，东方陶瓷协会创始人之一并担任首任主席。——译者注

② 威廉·克里夫利·亚历山大先生(Mr. William Cleverly Alexander, 1840—1916)，19至20世纪英国著名收藏家，伯灵顿美术俱乐部重要成员之一，以现存大英博物馆著名的张公巷汝窑“亚历山大碗”而闻名世界。——译者注

③ 查尔斯·兰·弗利尔(Charles Lang Freer, 1854—1919)，美国伟大的收藏家和赞助人，将大量的藏品捐赠给史密森学会，并资助美国政府建立弗利尔博物馆。——译者注

④ 海格立斯·里德爵士(Sir Hercules Read, 1857—1929)，曾任大英博物馆英国和中世纪文物与民族志部负责人。——译者注

⑤ 奥斯卡·拉斐尔(Oscar Raphael, 1874—1941)，曾任东方陶瓷学会主席，中国艺术的重要收藏家和鉴赏家。——译者注

⑥ 金璋(L. C. Hopkins, 1854—1952)，英国外交官，曾在华任领事。——译者注

第一章 远古时期

陶器,作为人类的必需品之一,是人类最早的发明。原始陶器与石器时代晚期的工具一起被发现,但没有证据表明这一时期的人使用过金属。所有试图发现陶器的最早时间的努力,都建立在猜测的基础之上。

虽然我们对中国的石器时代知之甚少,但可以有把握地假设:中国陶器,正如其他地方的陶器一样,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陶器的发明归功于传说中的神农,他是中国的特里普托勒摩斯(Triptolemus)^①。据说神农向人们传授农耕技术以及其他必需的生活技能。黄帝,是半传说的帝王,公元前2697年即位,自此循环纪年制度开始实行,据说他任命制作陶器的昆吾(Kun-wu)为管理陶务的官员。最古老的中国文献^②中指出,伟大的虞帝舜(前2187年—前2067年)“高度重视陶器”。的确,汉代历史学家司马迁记载,舜在登基前,曾在河滨(Ho-pin)制陶。无须多说,河滨制造的陶器是“完美无瑕的”。

根据《陶说》^③中的描述,中国陶瓷艺术的演变遵循的是正常的进程。最初制造的陶器是烹饪用具,然后“到了虞帝舜时期,出现了名称各异的酒器,祭器也逐渐变得完备”。^④我想补充的是,《陶说》的作者在阅读了关于艺术的早期著作后,得出了前后不一致的结论:“我窃以为陶器的起源应严格归于虞帝舜统治时期,其达到完备是在周朝时期。”

不幸的是,没有一个学者能说明陶钧何时在中国首次使用。的确,像其他国家一样,中国宣称发明了这种至关重要的器具,却没有真正的证据来支持这一观点。而且,即使陶钧是在中国独立发现的,最先发明陶钧的无疑是近东国家^⑤。明显的证据是,发现于克里特岛(Crete)^⑥、可追溯至大约公元前3000年的米诺斯彩陶(Minoan pottery),以及古埃及第十二王朝(大约公元前2000年)的埃及陶器,均使用了陶钧。然而,实际上可以肯定

① 特里普托勒摩斯(Triptolemus),希腊神话中的神,教会希腊人民农耕技术。——译者注

② 例如《考工记》,周朝(前1046—前256)时期著作。——原注

③ 《陶说》,清朝朱琰(生卒年未详)著,全书共分六卷,记述中国陶瓷的制作技术及其发展历程,是我国第一部著名陶瓷史,在国内外有一定的影响。——译者注

④ 参见卜士礼所译《陶说》英文版 *Description of 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 牛津克拉伦敦出版社, 1990年,第34页。——原注

⑤ 近东国家,过去主要指欧洲的巴尔干半岛国家(原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希腊、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亚洲的地中海沿岸国家(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约旦)和东地中海岛国塞浦路斯,还包括北非的埃及和利比亚。它们距离西欧较近,同西欧联系密切。——译者注

⑥ 克里特岛(Crete),位于地中海东部的中间,是希腊第一大岛。——译者注



的是，古埃及第四王朝（大约公元前 2600 年至公元前 2500 年）制造陶器时，已经使用了陶钧。

迄今为止，中国人没有明确的证据来对以上早于周朝文献的事实提出质疑。周朝文献中记载，使用陶钧的陶工（陶人）不同于使用模具的陶工（瓶人），前者制造大锅、盆、滤器、锅炉和盂等炊器，后者用模具制造称为豆和簋的祭器。我们得知，周朝时的中国陶工也使用司南和抛光轮。据《陶说》记载，拥有这些装备后，陶工们就能确保陶器的制作完成。

以上论述不管是否真实，却真正反映出中国人对于文物的崇拜之情。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陶工当时是受人尊敬的，因为我们在《左传》^①中读到这句话：“虞阙父为周初陶正，武王赖其利器用，与其神明之后，妻而封于陈。”^②

这些早期的陶器实物，不时从古墓中被发掘出来，《陶说》中描述了许多不同类型的陶器。无论是陶器实物，还是对它们的文字描述，都会引起我们的考古兴趣。

周朝的艺术品，如青铜器和玉器，在插图版的中西著作中广为人知。这种艺术品以祭司的形式出现，其装饰带有象征意义，反映的是一种祭司文化，外表威严冷峻，对感情和感官方面的吸引力嗤之以鼻。我们对陶器了解有限，但这有限的了解呈现的是纯粹实用主义的器物，外形简单，未施釉，几乎没有任何装饰。

插图 1 中的两类陶器，也许可以看成是周朝陶器中较受欢迎的器物。插图 1 中的左图与贝特霍尔德·劳费尔（Berthold Laufer）出版的著作^③中的一个三足器皿几乎一模一样。贝特霍尔德·劳费尔通过将这个三足器皿与周朝时期的青铜器进行类比，说明了它应归属于周朝的理由，并声称中国古文物研究者也确认其归属于周朝。这个三足器皿的陶土质坚呈灰色，器物表面呈黑色，并带有与插图 1 相同的阴影图案。有人认为，这种阴影图案是器物起源于周朝的确切标记，我也相信它是周朝时的一种常见装饰。但周朝之后，阴影图案仍有使用，在四川的一座汉代古墓里出土的陶器上还可见到，这些陶器现藏于大英博物馆。实际上，阴影图案与出土于日本和高丽国支石墓（the dolmens）^④陶器上的垫痕非常相似。建造这些支室墓经历了漫长时期，从公元前 2 世纪一直延续至公元 8 世纪。

① 《左传》，公元前 5 世纪的一部著作，在《景德镇陶录》第 9 卷第 1 页中被引用。——原注

② 这句话的大意是：虞阙父担任周朝初期陶正一职，周武王依赖其精湛的制陶技术，将帝室之女许配给他为妻，并封他为诸侯，领地为陈。——译者注

③ 贝特霍尔德·劳费尔（Berthold Laufer, 1874—1934），出生于德国科隆市犹太家庭，美国东方学家和人类学家，对中国陶瓷和玉器等都有研究。这里所说的著作指他 1909 年在美国莱顿（Leyden）出版的《汉朝的中国陶器》（*Chinese Pottery of the Han Dynasty*），第 10 至 14 页。——译者注

④ 支石墓（the dolmens），史前时期的一种石墓，集中在东北亚地区，高丽国是其中心地区。——译者注